

# 张恨水与张学良的交往

张恨水与张学良，头顶同一个“张”字，同为“张仲孝友”的传人。他们一个出生在关内，一个出生在关外，远隔千里，天各一方。即便在某个地方偶然相逢也互不相识，他俩却曾经因文结缘，成为民国年间一对相知相惜的好友。

## 张恨水撰文为张学良鸣不平

前几年，在阅读《张恨水散文全集》（谢家顺主编）时，我注意到两篇张恨水写张学良的文字。一篇是《最后关头》书中的《张学良与倭皇同庚》，一篇是《山窗小品》书中的《今日赠张学良》。

《张学良与倭皇同庚》发表于1938年5月29日重庆《新民报》副刊。一看题目便能感觉到张恨水力挺民国军人张学良，对渡海来犯的倭寇表现出强烈的嫌恶、鄙夷和仇视。既是倭寇，天皇又如何？不过是倭皇，不值得敬重。

《今日赠张学良》发表于1946年12月12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在中国现代史上，12月12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1936年的这一天，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张恨水自然记得这个重要的日子，且有兴致在重大的时间节点上为这个不平凡的日子写下专门的纪念文字，意在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日子，不要忘记张学良。

## 因小说《春明外史》而结缘

在《张恨水传》（解玺璋著）里读到这样的记载，张恨水与张学良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民国报人、小说家张恨水对青年军人张学良颇有好感，他把这种好感写进了小说《春明外史》。

爱读小说的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少爷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似乎从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对那个鲜活灵动的

“影子”很是满意，正如吃到美味的鸡蛋会让人对下蛋的母鸡心存感激一样，张学良因喜欢《春明外史》便对当红小说家张恨水特别欣赏。

据说张学良曾经慕名而来，亲自到北平找到未英胡同里的张宅，登门拜访张恨水，跟张恨水畅谈小说里外的话题，并向张恨水抛出一根橄榄枝——张学良有意延请张恨水做他的文化顾问，许诺月薪100大洋。这在当时对漂在北平以卖文为生、养家糊口压力颇大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是足以改变他一家子生存处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搁在其他人的手里，那可是求之不得的。

张恨水有自己的原则，他晚年曾有诗句曰“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那枚“文化顾问”的烫金官衔被捧送到张恨水面前，他并没有心安理得地照单接受。但他也没驳对方的面子，同宗同祖一文一武“二张”之间的深厚友情就此结下。随后应张学良之约，张恨水继《春明外史》后又创作长篇小说《春明新史》，投放在沈阳出版的《新民晚报》连载。张学良住在沈阳，可以天天坐在自家庭院里，喝茶抽烟时，闲看邮差刚刚送到的报纸，就能读到张恨水最新创作的长篇连载小说。

## 张恨水曾三次赴沈阳回访张学良

据《张恨水年谱》（谢家顺著）记载，在张学良来北平登门拜访之后，张恨水曾连续3次赴沈阳。3次回访张学良，张恨水明显有报张学良相知之意。第1次是在1928年12月13日至1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前，

张恨水乘平奉列车赶到沈阳。3个月后，1929年3月6日至8日，张恨水第2次赴沈阳。同年8月14日至23日，张恨水第3次到沈阳。

在张恨水的作品中也留下了他去沈阳的相关记载。1929年3月1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张恨水发表词作《忆江南》（四阙）序曰：“去岁，做客沈阳。旅梦惺忪，离怀缱绻，得断句曰‘吹不断，短笛满长安’。沉吟未定，忽然自觉。时寒鸡初唱，残灯尚明也。”张恨水去沈阳干吗？他说了，做客。有客就有主，主家是谁？张恨水没说，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同年6月24日，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表散文《乾隆怪诗》曰：“去冬赴沈，汉卿先生召与谈话，因数度至旧帅府。一次，晚十时矣，某候于一中式客室。”

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向来忙忙碌碌，每天要交多份小说连载稿件还要编辑出版报纸的张恨水，竟然放下手头的写作活儿，请人代为编辑报纸，连续3次奔赴沈阳。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在张学良希望他到场的时候，张恨水则以一位报人与作家的特有方式鼎力帮助张学良。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张恨水在关键时刻全力维护张学良。当年张恨水在北平创办一所美术专科学校。北平美术专科学校里有几个激进的青年学生特别痛恨张学良，曾计划暗杀张学良。校长张恨水得知情况，遂将同学们召集起来，举行时局分析会，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在张学良已经陷于“千夫指”的困境之时，张恨水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够不畏众怒，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学良说话解围，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方面说明张恨水遇事有主见，不会人云亦云，见到风就是雨。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恨水讲义气，够朋友，明明事不关己却偏不高挂起。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当时的国内抗战局势进一步恶化，南京后来也沦陷。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日寇屠城前他不得不逃离

南京，溯长江而上，由水路到重庆。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继续办报，宣传鼓舞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张恨水却选择由陆路东归。从重庆出发，经贵州、湖南到武昌，由武昌回到他的家乡安庆。

途中，经过贵州息烽县时，张恨水很想去看看张学良。对此，在张恨水儿子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有记载：“我们抵达息烽那天正是中午，连吃饭带休息只有两个小时。在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见他的。’父亲想起了他和张将军的友谊，为之叹息良久。”到了贵州息烽，与张学良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张恨水心中的那种无奈可想而知。

其实，张恨水挂念张学良，想看望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岂止是在路过贵州息烽的那个中午停车吃饭的短暂时刻。张恨水在重庆期间写过一部令读者大为叫好、当局却不让他写下去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他曾经被当局予以威胁性的警告，说他写得太多了，若再写这样的文字就会将他送往贵州息烽去。张恨水差一点就因文获罪，险些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息烽集中营。在陪都重庆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息烽”一词时常出现在他的眼前，张恨水怎能忘记远在贵州息烽大山里的朋友张学良呢。

我曾经在阅读中产生疑惑。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大孝子的张恨水本已归心似箭，想早一刻回家见到他睽违已久的老母亲，却为何选择那条先南下后东上绕贵州的回路呢？也许其中有主客观多种因素吧。但张恨水想接近张学良，企盼路过息烽时能侥幸见到张学良，跟张学良问声好，说上几句宽慰的话语，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归途中的张恨水，一路上充满游子归家的期待和喜悦。可惜，途经贵州息烽，且作短暂停留，却未能如愿见到张学良，张恨水只能带走一份浓重的遗憾和无奈。

王张应《文史天地》

# 倾听革命先辈故事，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 追忆南京中国银行第一位中共党员耿一民的烽火岁月

倾听一位革命先辈的故事，就是播下一粒红色种子；接受一场革命精神的洗礼，就是注入一股奋进力量。

耿一民，南京中行第一位中共党员，凭借特殊的身份奔赴在革命的道路上，在坚定革命信仰、严守党的纪律中，为南京中行早期的发展和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从钱庄学徒到加入党组织

1915年，耿一民出生于扬州江都县邵伯镇，由于家境贫寒，9岁时来到扬州钱庄当学徒。后来钱庄被南京中行收购，钱庄掌柜带着他一并加入了南京中行，那年他刚满14岁。南京中行在后来考察耿一民时，认为他从小在钱庄当过学徒，是“老钱庄的人”，父亲也是老中行的人，因而在使用上比较放心。后来耿一民在南京中行先后从事文书助理、文书股主任等职务，逐渐成长为南京中行的中层管理人员。

1938年4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南京中行第一位中共党员，时年23岁。考虑到耿一民的特殊职业，党组织把保管党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这个工作交给了他。据解放后首任中行南京分行经理顾公泰回忆：“抗战期间，当时金融机构里的地下党员耿一民、陆兰秀（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等人，他们之间没有横向联系，都各自独立作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坚决的斗争。”

## 从破“文化围剿”到创“大公书店”

全国抗战爆发，南京中行撤退。耿一民

先后被调到中国重庆、越南河内、中国桂林等地中行工作。在桂林期间，他积极帮助党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解决经济方面的困难，支持革命进步书刊出版工作。1941年9月，耿一民将书店以合股民营书店的形式营业，通过各种发行方式和渠道销售“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的书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大公书店”于1941年10月正式开业。书店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个要点，地下党员或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在书店的掩护下从事革命活动。在桂林被日寇占领前夕，耿一民不顾个人安危，利用银行主任身份动用运钞车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地下党员30多人，从白区安全转移，为保全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 从话别重庆到再回南京

1945年12月19日，耿一民筹办“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南京分会”（简称“经协”），在南京地区开展中共地下党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1946年6月，他联动汪季琦、张启宗、欧阳执无、王希贤，五人在南京中行小火瓦巷宿舍建立了“经协”南京分会，联合南京“民盟”组织呼吁国内和平。1946年6月，上海派出以马叙伦、阎宝航为

正副团长的10人和平代表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耿一民带领的“经协”不仅承担了接待、联络和保护等工作，还积极声援他们的正义行动。

1947年“五·二〇”运动爆发。他组织“经协”会员声援和捐款救助，并掩护被追捕的学生。至今，耿一民家人还珍藏着创办“经协”南京分会的书面委托书，这份委托书不仅代表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委托，也代表着耿一民对党交办任务的珍重。

1948年，他在南京中行电台截获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密电，通过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转到党中央，得到党中央的表扬。耿一民在长期隐蔽、广交朋友中，先后陆续吸收了金融、财经、农林等系统的进步人士为会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团结了一批工商、银行界的知名人士。

## 从“三勤三化”到“洋服金碗”

“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这是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耿一民便是“三勤三化”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许多认识耿一民的老人还记得，当年耿一民总是“洋服”笔挺，皮鞋锃亮，再加上有着银行工作“金饭碗”的庇护，显露出专业化、职业化、学术化的素养，很难让人想到他是共产党员。

1946年9月，由南京市银行公会倡议，经耿一民运筹成立了“银社”。1948年8月，他当选为副总干事，“银社”吸引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群众。“银社”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是出版《银讯》，一直出版到南京解放，这个刊物深受银行职工的喜爱，也在悄无声息中传播了先进思想，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银行员工的深层次沟通联系搭建了交流渠道。

##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南京解放前夕，耿一民在南京中行任文书股主任，在该行秘密发展支从敦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国民党当局命令在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等向广州和台湾撤退。针对形势变化，耿一民与南京中行其他党员同志一起组织开展了护行、留人等工作。在迎接南京解放中，他还在小火瓦巷宿舍阁楼上印制大量传单，号召人民为解放南京作准备。

与此同时，为保护中行账册财产等工作，他联动地下党员组织了“应变会”。后来南京解放时南京中行300余人全部坚守岗位，还积极组织员工对全行账册、档案等进行清理登记、保管，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南京中行档案账册。同时极力保护南京中行财产，防止国民党掠夺，他与丁永楨、支从敦等地下党员极力保护南京中行的1100两黄金安全，后来这笔财产悉数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后，耿一民先后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南京市工商局、人行南京分行、人行江苏省分行和中行南京分行等单位任职。1982年12月6日，病逝于南京。

革命先辈精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耿一民同志不仅对党交办的任务能够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蕴育出坚定的革命初心和家国情怀，而且对在中行内的本职工作也是精益求精、专有所长，彰显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为民情怀。他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在新征程上，要在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继承红色金融文化的为民情怀、爱国主义热忱、艰苦奋斗精神，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蒋中宇 李庄